



北方第三城之争，青岛如何“转守为攻”

发消费券 不如发现金？

□ 胡金焱



2019年，我国GDP过万亿的城市，已多达17个。同时，座次也发生了较大变动。

青岛以1.17万亿元位居第14位，处于10年来的最低位，不仅与位居前列的杭州、南京差距进一步拉大，而且被宁波、无锡赶超，后面则被郑州、长沙逼近。

同属北方城市的郑州，GDP是11590亿元，与11741亿元的青岛，差距仅有区区151亿元。

2000年，青岛GDP超越大连和沈阳，成为京津之后的“北方第三城”，至今已保持足足20年。

“北方第三城”会否在短时间内易主，成为社会热议的一个焦点话题，也是青岛必须直面和破解的重大课题。

20年的“北方第三城”，面临挑战

上世纪90年代，青岛家电制造异军突起，成为唯一能与广东抗衡的家电之都。2016年，青岛成为全国第12个GDP“万亿元俱乐部”城市。2017年，青岛规模以上工业产值18280亿元，与苏州、上海、天津、深圳，并称中国五大制造业中心。

但荣耀背后隐忧浮现。近年来，随着珠三角、长三角先进城市的快速发展，中西部传统城市的快速崛起，青岛逐渐陷入标杆新远、追兵逼近的窘迫局面，甚至连守住传统“北方第三城”的地位都面临挑战。

作为国家战略机遇加身、资源禀赋优越的青岛，正应在反思中奋起，以更高目标、更大魄力“学深圳、赶深圳”，谋划城市发展的新跨越。

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大背景下，于青岛而言，关键是如何更加清晰、清醒地认识当下困局，综合把握天时地利人和优势，紧紧抓住产业转型升级这个核心，妥善处理短期脱困与中长期发展的关系，在新赛程中把传统荣耀发扬光大，以高质量发展点亮城市未来。

不苦恼于“失守”，不焦虑于“一时之得失”

青岛应以更高定位和发展思维，审视“北方第三城”之争，以转型成效和发展实绩，回应“北方第三城”之争。

不可回避的是，未来青岛丢掉“北方第三城”的位子，确实存在可能性。关键是青岛应以何种心态，来正确看待这场“危机”。

首先，思想上要突破“守城”观念，跳出城市GDP“锦标赛”的排名思维。城市发展充满复杂性的系统工程。每一座城市的发展，都不是始终直线上升的，必然要经过螺旋甚至是波折。任何短期思维和急躁心态，都容易导致忽略城市发展的本质规律，影响“调整之后再出发”的长远发展。

作为青岛的对标城市——深圳，在发展历程中也曾经出现过三次经济下滑，但最终都通过实施长远发展战略，走到了时代最前端，成为我国产业发展和创新引领的高地。

同样，青岛也大可不必苦恼于“北方第三城”被围城甚至是失守，不必焦虑于“一城之得失，一时之得失”，而要把重心放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上，把方向放在谋划城市长远发展布局上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在城市发展进程中不断化危为机，以高质量发展实现凤凰涅槃、浴火重生。

对标最前列，跳出“北方第三城”这一小视野

青岛要放眼全国，对标国内城市最前列，谋划赶超之策。

随着越来越多的南方甚至中西部城市，加快发展，迅速崛起，我国南北发展差距日益扩大，青岛如果还是盯着“北方第三城”之争，则已经意义不大。必须放眼全国，立足城市发展整体格局，谋划城市发展的对标和赶超。

特别是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社会主义先行区的叠加赋能，珠三角地区形成了以深圳、广州、佛山为代表的城市群。长三角地区形成了以上海、杭州、南京、苏州等为代表的城市群。发展态势亦十分抢眼。同时，中西部地区抓住大开发、东部产业转移等战略机遇，正在加速形成以武汉、成都、郑州、长沙等副省级城市、省会城市为代表的新城市群。

这种大态势，才真正应该引起青岛的重视和思考。思考如何在胶东经济圈一体化发展中，发挥龙头城市作用；如何与京津冀、沿黄流域、东北三省，形成良性互动；如何在国家区域协调发展和纵深开放格局中，打造长江以北地区新的重要战略支点；如何走出一条北方城市可借鉴、可复制的城市转型发展之路。

因此，青岛绝不能局限于“北方第三城”这个小视野，而应按照目前“南深圳、北青岛”的城市对标发展思路，着眼于跃居，稳居全国大城市最前列这个大目标谋求发展。这是当下青岛需要认真研究、严肃对待的问题，也是青岛应该肩负的城市发展使命。

在国家发展大局中，青岛一直是面向世界开放发展的“桥头堡”，是站在我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“先行区”和“示范田”，如首批沿海开放城市、计划单列市、副省级城市以及“一带一路”双节点城市、国际性港口城市、国家军民融合示范区等。随着上合示范区、山东自贸区青岛片区等新的国家战略叠加赋能，青岛在国家发展战略布局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，责任和使命愈加重大。

这些都充分表明，青岛不仅仅是我国北方的一座城。青岛在谋划城市发展过程中，不但要突破“保住北方第三城”这个“小格局”，立足“跃居和稳居国内城市最前列”这个中期目标，还要瞄准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这个“大战略”，义不容辞地站到世界舞台上。这才是时代赋予青岛的发展定位，也是这座城市勇担国家战略重任的必然选择。

排位之争，背后和实质是产业转型升级之争

城市排位之争，背后和实质是城市产业转型升级之争。谁率先抓住了科技革命的重大机遇，实现了产业的转型升级，谁就能站在新一轮发

展的风口，获得持久不断的发展动能。

青岛作为我国传统的制造业中心，2019年第二产业增加值仅为4182.76亿元，与2016年基本持平。反观宁波，从2016年开始，即将新动能产业作为主攻“城墙口”，重点发展新材料、高端装备、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。2019年，宁波第二产业增加值为5782.9亿元，在前15城市中工业产值占比最高。

从头部企业的引领看。郑州引进富士康，带动电子产业信息增加值5倍以上，直接和间接带动就业超30万人，带动华为、中兴等一批大企业纷纷落户郑州，催生了河南首个年产值超千亿元的产业集聚区。京东方落户合肥，累计投资超1000亿元，吸引了100多家上下游配套企业落户，以全产业链布局成为国内新型显示领域产能最大、产业链最完整、技术水平一流的集聚发展区。2019年，深圳华为营收8588亿元，杭州阿里营收3768亿元，而青岛海尔、海信营收分别为2800亿元、1269亿元。头部企业对青岛城市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，尚有巨大空间。

从信息化与实体经济的融合看，武汉东湖高新区聚集了小米、科大讯飞等近30家知名互联网企业；长沙移动互联网企业2.6万家，互联网产业产值突破900亿元；无锡更是集聚物联网企业2000多家，2019年物联网产业营收超2800亿元，约占江苏省的一半、全国的四分之一；集成电路产值超1100亿元，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二。根据腾讯研究院发布的《中国“互联网+”指数报告(2018)》，武汉排名第6位，长沙排名第10位，而青岛仅排在第20位。

产学研一体化，正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。2019年，深圳吸纳技术成交额1506.4亿元，南京、武汉和成都均超过500亿元，而同期青岛吸纳技术成交额仅为199.67亿元，在副省级城市中排名第10位。

充分挖掘“机遇”和“红利”

2018年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后，青岛的战略机遇持续放大。

2019年7月，青岛获批建设上合示范区，被赋予打造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合作新平台，与中国上合组织国家互联互通的“国之重任”，并与深圳在国家战略层面同框。同时，中国(山东)自由贸易试验区获批，作为三大片区之一的青岛片区同时设立，被赋予打造东北亚国际航运枢纽、东部沿海重要的重要的物流中心、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的重任。

2019年9月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，青岛作为沿黄九省区的主要出海通道，在发挥山东城市龙头作用，推动沿黄地区中心城市及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方面大有可为。

同时，作为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的三大核心城市之一，青岛被委以引领全省经济发展的重任，要发挥标杆示范城市关键作用，成为国家东部地区转型发展的增长极。

2020年，山东又发布《关于加快胶东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，青岛作为胶东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牵头城市，要着力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、辐射带动力、创新引领力、人才集聚力，

全球疫情持续蔓延，山东有无“断链”之忧

□ 范玉波

的巨大冲击，仍是我们必须破解的重大课题。

作为“世界工厂”，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到世界份额的28%以上。山东作为制造业大省和外贸大省，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缩影。

山东是全国唯一一个拥有全部联合国所分41个工业大类的省份。在207个中类中，山东拥有197个，其中制造业占179个；在全部666个工业小类当中，山东也占到526个。

但山东制造业全而不强的特点比较突出，域内产业链条短，合作不够紧密，抗风险能力差。

许多大类的产业链不完善，只是海外链条的一个环节。虽然近年来自主品牌商品出口大幅增长，但也仅占全省外贸出口总值的23.5%；很多制造业领域，缺乏全球供应链主导权，缺乏链主企业，对制造业的高端环节缺乏控制力，一些关键设备仪器与核心技术受制于人，处于价值链中低端；许多产业链的下游，严重依赖国际资源，例如石油、铁矿石、大豆等大宗商品；由于缺乏核心技术，许多产业的核心零部件严重依赖国际供应，如芯片、高端数控机床等。

这些都是山东产业链条上的脆弱点，极易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。

此外，疫情发生前，一些欧美国家已致力于推进制造业回流，启动“再工业化”进程，希望在新的高度上夺回制造业发展的主导权。此次疫情又使欧美国家的制造业产业链瓶颈一览无余，特别是口罩、防护服、呼吸机、原料药等医疗器械和医药生产严重不足。在此背景下，发达国家纷纷启动产业回归计划。

2019年，山东外贸进出口总值2.04万亿元人民币，外贸依存度达到28.7%，和全球产业链联系密切。前5大贸易市场，分别为美国、欧盟、东盟、韩国和日本。

中小企业虽“不起眼”，却是链上重要“环节”

“六保”之中，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，对于保居民就业、保基本民生、保市场主体等，具有基础性意义。

山东经济，制造业占比高，生产企业和流通企业与外部联系密切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不仅是当前应对风险挑战的重要抓手，更是着眼长远、化解深层次矛盾，加快推进新基建、发展新经济、形成新动能、改造提升

传统动能的关键之举。

山东应力促应对疫情压力与推进新旧动能转换“同向而行”，以积极作为化解不确定性，充分利用好防疫时间差，逆势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，推动制造业向价值链中高端加速优化升级。

深入推动中小企业复工复产，打通产业链条。山东中小企业数量约为240万家，个体工商户数量超过560万户，是整个产业链的基础，但抗风险能力普遍较低，在疫情中受到影响也较大。近一半企业3月后才复工，复工后的企业大部分也未完全恢复达产。对此，应深入落实疫情期间出台的促进中小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的措施，加大减税降费、减免租金、新增优惠利率贷款等帮扶力度。

同时，中小企业在产业链中处于从属和弱势地位，在复工当中起不到引领和风向标的作用，对此需坚持以大带小、上下联动、内外贸协同原则，聚焦重点产业链，以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配套中小企业，推动金融机构、供应链核心企业建立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，为上下游中小微企业提供高效便捷的融资渠道。

用好防疫“时间差”，逆势强链、补链

我国疫情最先得到控制，赢得了宝贵的疫情防控时间差。

山东利用好这一时间窗口，梳理重点产业的产业链条企业名称，了解企业面临困难和政策诉求，加强政策支持。

一类是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的产业，在全国居于重要地位，基础强、体量大，占比高，如化工、医药、纺织服装、造纸、农产品加工、电解铝等产业，对这类产业，主攻方向应是在保持传统优势的基础上，强化产业链的核心环节，固链、延链，加快向下游和终端产品发力，不断增强产业的科技水平和发展后劲。

另一类是虽然有一定的产业基础，但是领军企业太少，在全国的定位不突出，在一些链条具有薄弱环节，如手机、电脑、智能设备、新材料、汽车制造等产业，应启动培育计划，做好国内分工，强链、补链，补齐产业链的薄弱环节，横向打造现代产业集群，培植一批具有“链主”地位的引领型企业，具有“撒手锏”产品的关键零部件配套企业。

担起打造全省高质量发展强劲引擎的重任。

从地缘优势看，青岛地处“海三角”核心——北接正在振兴中的东北，南接长三角，对内与京津冀、沿黄流域、东北三省形成发展互动，对外面向东北亚、联通日韩，是中国长江以北地区国家纵深开放的新的战略支点。

目前，青岛正处在“凤凰浴火”的阵痛期，同时也是“破茧而出”的转型期。在青岛下一步的城市发展战略中，关键是要充分挖掘独特的国家战略机遇和资源禀赋红利，深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and 转型升级，在新赛程中以新动能驱动“超车”。

搭乘工业互联网“动车”，融入“全面在线”时代

未来发展中，青岛要强化头部企业引领，激活全产业链“葡萄串”式集群发展。曾经的“五朵金花”，成就了享誉世界的“青岛制造”。在产业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，青岛应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龙头企业引领、配套企业跟进、纵向产品配套、横向资源共享的“葡萄串”经济模式。要立足青岛产业布局循环、缺口和企业需求，放大坐标，面向国内外，聚焦抢占新技术、新产业、新业态、新模式头部企业。特别是瞄准独角兽、瞪羚类拥有高新技术、高成长性的创新型领军企业，提升招引专业化水平，用专业队伍、专业态度、专业思维，实施专业招引、科学招引、精准招引。同时，青岛对标深圳，与深圳政府和企业交流密切，应进一步推进与深圳企业界的强强联合，整合人才和科研优势，以组建产业协会等方式，共享头部企业资源，推动全产业链集群化发展。

以数据中心、工业互联网等为代表的“新基建”，正成为我国经济重要的战略发展方向。青岛应积极抢抓新风口，充分发掘“新基建”对经济发展的长期价值和产业转型升级的“乘数效应”。

互联网时代进入下半场，工业互联网正成为“新基建”赛场上最有潜力的“新赛道”。这是青岛产业转型升级，实现“换道超车”的绝佳机会。目前，青岛提出“四年5000亿，再造一个新海尔”，加快建设核心要素齐全、融合应用引领、产业生态活跃的世界工业互联网之都。下一步，应积极抢抓重大窗口机遇期，充分发挥制造业优势，搭乘工业互联网的“动车”，全面推动本土产业和优秀企业融入经济“全面在线”时代，推进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现代工业技术深度融合。

放眼未来，随着国家战略和政策红利的不断释放，只要青岛坚持长远规划，久久为功，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，做好产业转型升级这篇大文章，就一定能够迎来以更高水平开放引领更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春天。

(作者系青岛大学党委书记、山东大学省级新型智库“区域金融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”主任)



更多内容，请扫码关注

全球疫情持续蔓延，山东有无“断链”之忧

□ 范玉波

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世界大流行，且持续时间越来越长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。

一些国家，因防疫需要临时性“闭关锁国”，引发生产停滞，工厂关闭。许多发达国家，为求自保，纷纷启动“产业回归”计划。如美国为了达到激励企业返回本土的目的，提出承担企业回迁的全部成本，包括重建厂房、搬迁设备、装修及其他相关费用等；日本政府也将拿出约2400亿日元，帮助日本企业把在中国的工厂撤回日本国内。

在此情势下，作为制造业大省和外贸大省的山东，有无“断链”之忧？又该如何用好“防疫时间差”，逆势补链、强链？

“太集中于中国”不是风险，“全球停摆”才是

首先要明确的是，将产业链供应链大规模移出中国，根本不具有可操作性。

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，中国作为“世界工厂”的地位不会改变，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枢纽地位也不会改变。

中国拥有世界上门类最全、配套最完备的制造业体系，拥有日益强大的研发创新能力，先进完备的基础设施体系和难以取代的综合生产成本优势，拥有令每个国家“垂涎欲滴”的巨大消费市场。可以说，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上的竞争优势地位，无可替代，也难以撼动。

同时，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认识到，全球供应链的风险，并不是由于中国集中度太高而造成的，而是因全球性的经济停摆而引起的。

而且，随着中国疫情率先得到控制，经济秩序全面恢复，目前已成为全球生产能力最稳定的地区，正在大幅增加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，并尽全力确保与世界各国产业不脱钩、合作不断线，在稳定和畅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方面，发挥着重要作用，展现了大国担当。

山东制造业“全而不强”，外贸依存度较高

世界离不开中国。与此同时，中国也离不开世界。

尽管疫情不太可能导致全球产业链颠覆性重构，但如何应对疫情给产业链供应链带来

——扩内需首先要答好这“三问”

□ 娄飞鹏

目前来看，全球疫情短时间内很难得到彻底控制。此种情势下，稳住经济基本盘，更多要靠内需的支持。这也是中央强调“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”的用意所在。

各地纷纷推出扩内需、促消费、稳投资的举措，提振市场信心，激发经济活力。但同时，一些举措也引起热议。如：为什么我们国家刺激消费，主要采取发消费券的形式，而其他一些国家却直接发现金？各地为了保中小企业、保居民就业，给予企业经营贷款贴息等支持，但一些地方却出现了拿着优惠贷款炒房的现象，这个问题怎么解决？投资拉动，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有效手段，但当前基建的步子，究竟该更大一些？还是该更谨慎一些？

补贴企业还是补贴居民？

新冠肺炎疫情爆发，对供给和需求都有冲击，但在不同阶段，主要的冲击领域不一样。

疫情暴发初期，受封城、封路、严格隔离等措施影响，经济所受到的冲击主要集中在供给端。随着疫情防控向好态势不断巩固，国内目前已基本实现全面复工复产，供给端问题逐步解决，需求不足问题正加速暴露。

如2、3月份的非食品类CPI，一直下降并降至0.7%的低位；生产者价格指数(PPI)，在3月份已降至-1.5%，生产资料类PPI降至-2.4%。4月份的采购经理指数(PMI)中，制造业PMI新订单指数、非制造业PMI新出口订单指数下降，也说明需求不足。

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，如果不重点强化对需求的支持，仍将供给作为重点支持对象，则不仅无助于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影响，反而可能进一步恶化经济形势。这是由于，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，增加供给的结果往往是导致库存增加，产能过剩，也会因此而压缩信贷投放，并有可能进入需求不足——供给压缩的恶性循环。更有甚者，如果处理不好的话，这种影响将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，还有可能进一步蔓延至金融领域。具体表现为：一方面是需求不足——供给压缩导致信贷需求减少，金融机构面临信贷投放缺少有效需求的问题；另一方面是由于需求不足——供给压缩，金融机构信贷面临较大资产质量下降压力，也会因此而压缩信贷投放，这将进一步引发信贷紧缩，并导致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，强化需求不足——供给压缩的恶性循环。

换句活说，就此时的情况来看，补贴企业实质是“输血”，补贴居民则是“造血”。

中小微企业，是稳定和扩大就业的主力军。疫情发生后，从中央到地方，对中小微企业采取了一系列支持举措。然而，在此过程中，也出现了部分企业利用政策空间套利等问题，如企业利用贷款贴息之后的低息贷款，投资房地产造成脱实向虚，以及利用低息贷款购买理财产品赚取收益，造成资金空转等。对此，应完善政策设计，加大监督力度，确保支持政策真正用到企业经营上来。

同时，大幅增加对居民的补贴。扩大有效需求，能够有效增加对企业产品和服务的需求，同样可以起到稳定企业经营的效果。而且，“造血”比“输血”更具有可持续性。近期，各地陆续加大发放消费券的力度，即是出于此种考虑。

发消费券还是发发现金？

扩内需，首先要“促消费”。这是因为，消费已连续6年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。如何促消费？着力扩大居民消费，适度扩大公共消费。

就扩大居民消费看，重点是用好中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因素，提高其消费能力。一方面应按照“六稳”“六保”的要求，稳定和扩大居民就业，保障居民收入来源。一季度居民新增存款同比大幅度增加，主要是疫情应对隔离措施限制了居民消费，新增存款主要集中在有稳定收入的群体，农民工等非正规就业群体缺少收入来源，其存款不仅新增有限甚至可能是负增长。另一方面是向中低收入和困难群体，发放临时补贴或者消费券。

在给居民发发现金还是消费券的方式选择上，需要结合具体情况，理性分析。

一些国家的居民，普遍储蓄较少甚至没有储蓄，发放现金补贴后，会更更多地用于消费。这意味着，发发现金就可以较好地起到刺激消费的作用。而我国居民，储蓄规模较大，尤其是对有较多储蓄的群体，发放现金不一定能起到很好地刺激消费的效果。因此，虽然采用发放消费券的方式，可能会带来诸如“消费券如何设计”之类的额外成本，但这确实是一个相对更好的方式。

问题的关键在于，补贴必须瞄准中低收入和困难群体。可利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，结合存款、电费、水费、燃气费缴纳等数据，相对更精准地确定补贴对象。同时，消费券应纳额而不应该限定消费种类，这样可以更好发挥其刺激消费的作用。

除此之外，可围绕教育、医疗、养老等领域，开发若干新的消费增长点。

扩大公共消费方面，一方面应结合疫情期间暴露出的公共卫生领域短板，把重心放在就业、科教、医疗、民生等领域；另一方面应围绕“六稳”“六保”，通过公共消费支出，更好带动居民消费扩大。

基建步子更大一些，还是更谨慎一些？

虽然投资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拉动作用，较之前有所下降，但扩大投资仍是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方面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，我国迅速出台4万亿元投资计划，虽然因此带来较多问题，但不可否认此举对稳定国内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。目前来看，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，可能比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更大。此时扩大投资，尤其是扩大基建投资，仍然十分必要。但需要借鉴之前的经验教训，做好政策设计，着力扩大有效投资。

考虑到经济所受到冲击的严重程度和经济规模等因素，扩大投资的具体规模不可拘泥于甚至超过4万亿元。

同时要思考投资结构的问题。从投资领域看，要充分发挥基建在稳定和推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，加强“传统基建”投资，以保障投资规模；加强“新基建”投资，以引导并推动结构转型，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，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。从投资主体看，不仅要积极发挥政府在投资中的作用，还要积极鼓励引导民间投资，尤其是“新基建”要充分调动民营资本投资的积极性，让民营资本作用得到更好发挥。

此外，不论是扩大公共消费，还是扩大基建投资，都需要财政加大投入。在受疫情冲击，财政收入减少而支出扩大的情况下，财政赤字率提高是必然的。在财政赤字率和特别国债发行规模确定后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迅速形成有机配合，加快政府专项债券和特别国债发行，及时扩大财政支出，尽快增加有效需求。(作者系财政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，研究员)